

法國進步作家論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0(1)

175774

723/7151

0(1)

723/7151

法国进步作家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法国〕阿拉貢 斯梯 著

盛澄华等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955 字数29,000 开本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frac{3}{4}$ 插页2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7)0.22元

出版說明

这个集子里收集的是法国两位卓越的共产党员作家——阿拉貢和斯梯——的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討論的四篇論文。其間涉及好几个問題，都和我們今天文学工作者所面临的各項問題有密切的关系。如作家要不要进行馬列主义世界觀的改造問題，文艺須要不須要党的領導問題，政治內容是否作品的主要內容問題，战斗的文学是否一定会“公式化”問題，写作中是否有“灵感”、“个人才能”、“天生的作家品質”等問題，两位作家在这几篇东西中都有充分的發揮。

目 次

作家的任务和自我改造·····	阿拉貢作	林秀清	盛澄华譯	(1)
干部和作家 ·····	斯梯作	馮俊岳譯	(18)	
明日的文学 ·····	阿拉貢作	林秀清	盛澄华譯	(33)
論詩·····	阿拉貢作	林秀清	盛澄华譯	(41)

作家的任务和自我改造

——原名：从維民到亞烏捷揚科

阿 拉 貢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恩格斯的这句话是这一門奇异的新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当人們从事發明这門科学的时候，他們已先学会了怎样克服天花，怎样超越海洋与山脉而互相通話，怎样在云層上飞翔。我所指的这門科学就是人类改造自己的这門神奇的科学：它使一个罪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它使那被旧社会、被黑暗势力所摧残了的人变成为一个新社会的人，一个跟“历史”規律相适应的人。

开鑿白海通到波罗的海那条运河的伟大經驗，使曾經是社会渣滓的成千成万的男女，面对必須完成的任务，在少数国家保安工作人員的領導、說服和教育下，終於体会到：一个小偷已到了必須改变自己的“职业”的时候，要不然，想一想吧，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哪里还有小偷容身的地方！——这个伟大的經驗，在新科学上所起的作用，正像在牛頓面前所落下的那个苹果在物理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今天我們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时机，頗像从猴子过渡到人的那个时期；我們今天处于人类从阶级社会，从人剥削人的社会过渡到消灭阶级的社会；我們今天所处的时机，正当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刚刚担負起这样一种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人类的自我改造，要把我們这时代的社会人猿改造成为未来的社

会主义的新人。

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大无畏地进行着的这桩工作，無疑是全人类的大事。因此尽管人們存有各种怀疑，它仍然吸引了一切想要在人类前进中有所贡献的人們的視線。只是这些人把人类的前进，最多像維克多·雨果一样，想像为象征性的海船、暴風雨的天空、灿烂的光流或是冲破繁星閃爍的黑夜的巨人。

全世界真正关心人类思想和文化前途的人們，沒有一个不怀着顧慮或希望把目光轉向苏联，找寻答案。但是，我們在这里只准备談一談苏联的作家。

当代最以想像力聞名的、目前文壇上最敏銳的預言家之一、“星球战争”的作者 H.G. 威尔斯，于 1934 年 7 月 23 日会見了这么一个人：这人的实际工作極有可能使世界上产生一种新的人类，他們将来会把这位現在被認為大胆的作家的巨人般的幻想，当作一些胆小的童話来念。H.G. 威尔斯在 1934 年 7 月 23 日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些問題，当时他那样子确实有点像一个冒险的投机商人面对着一个發明家。这位發明家的灵机一动，就可以把我們这位商人借以發財的精心杰作，变成一錢不值。当威尔斯向斯大林說下面这段話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胸有成竹的作家的嘻嘻哈哈的玩笑后面藏有滿腹的憂慮：

設計一个改造人类头脑的五年計劃，这倒是件蛮有意思的事情。为了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显然人脑里还缺少許多必要的零件。

好一个怀疑家，这位威尔斯先生！很明显，在改造人类这件事情上，他所想的和維克多·雨果不一样。雨果把未来的人想像为一个古希腊的英雄站在一只自天而降的船头上，而威尔斯作为一个道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者，作为“隱身者”的作者，很自然地在他的心目中所出現的是一間外科手术室：头盖骨揭开了，外科医生正在

取出腦子，一些洗滌干淨的小盒子里，天曉得，裝的都是人造腦。為旁人用的腦迴是橡膠做的，為億萬富翁用的是鎢錠做的。

可是斯大林對威爾斯的嘲諷只以一笑置之。當然，他可以請威爾斯先生到蘇聯各地去觀光一下，讓他看看人類靈魂的驚人的建築工場。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擬定一個像威爾斯所要求那樣的五年計劃；但在每個五年計劃的過程中，特別是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蘇聯建設的進程遠比威爾斯預言里的主任醫生所能做得到的，更深刻地把人進行了改造。

當人們閱讀 1934 年 7 月 23 日的這篇談話記錄時，不能不驚奇威爾斯的對話者竟那樣耐心地接待了這位自以為是、夸夸其談的作家。而正就是這個人，他向威爾斯及其同行指出了他們在人類改造當中應起的作用。這種作用，不是在遙遠的將來，而就是在目前，這對作家來說已是早不敢想望的事情了。斯大林稱作家為靈魂的工程師，人們對這個稱號雖已談得很多，但還值得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如果人們因此以為在蘇聯，而且只是在蘇聯，作家才負有這種新的任務，那就錯了。斯大林那句話獨特的地方，是在給作家一個定義，同時使大家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實際存在的事實，這個一點也不是新奇的事實。作家從來就是靈魂的工程師，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只要他們一旦認識了這個事實，他們就將不再是這門發展着的科學的魔術家，他們會變成名符其實的靈魂的工程師，也就是在科學意義上的工程師。

既然作家對社會負有責任，那末社會就有理由來過問他們所寫的作品：這些作品怎樣完成自身的任務，它們怎樣培育了讀者，它們的目的是什麼和為誰……

的確，作家所負的這樣一個任務並不是新產生的。“哈姆萊

特”的作者^①和“費特爾”的作者^②都是靈魂的工程師。歌德和波特萊爾也是靈魂的工程師。需要弄清楚的是什麼樣的靈魂。因為不僅是文學上的天才，就是那些該受唾棄的作家，他們也是靈魂的工程師，他們把讀者的感性吸引到

“那插着枯萎的馬鞭草的花瓶……”

的周圍。

既然資產階級的靈魂工程師可以從徐里·普律多姆^③，通過克勞台^④（“我的將軍，一切聽命”），一直數到保爾·莫朗^⑤，那末當然也應該有無產階級的靈魂工程師。1935年2月28日季米特洛夫^⑥在莫斯科對蘇聯作家們所作的有關文學的一次精辟的演講中，有名有姓地指出：是俄國的小說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真正地把他培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個戰士，使他成為敢於在萊比錫法庭上只身和法西斯搏鬥的這個人。他的這個說明照亮了文學史：這個說明給作家們指出了真正的目標。誰不願意做那樣一個作家，有一天像季米特洛夫那樣一個人會提到他說：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靠這個人的幫助。

靈魂的工程師這句話，也使寫作的技巧得到了真正的評價。如果一個工程師不重視他自己那一行職業的知識，那他就不是一個

① “哈姆萊特”是英國大戲劇家莎士比亞的名著。

② “費特爾”是法國17世紀悲劇詩人拉辛的名著。

③ 徐里·普律多姆(Sully Prudhomme, 1839—1907)——法國資產階級哲理詩人。

④ 克勞台(Paul Claudel, 1868—1955)——法國天主教詩人。

⑤ 保爾·莫朗(Paul Morand, 1898—)，法國現代資產階級小說家。

⑥ 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國際工人運動的卓越活動家。1933年曾在萊比錫法庭上嚴厲地譴責了法西斯主義，表現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英雄氣概。

好工程师。人們可以看出，从这个定义出發，作家怎样使自己全部新的态度有了依据；从这个定义出發，作家这一职业怎样重新取得了地位。

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这一个历史阶段里，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就有責任担负起我們所說的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消灭阶级社会时期改造人类的历史任务。他們最終的目标必然就是要促使新人类的誕生，哪怕这还是遥远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过渡时期，在無产阶级专政时期，作家实际上是那样地受到無产阶级政权的关怀。苏联政府如此重視 1934 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一个明証。但是，这种关怀，也要求在作家方面担负起相应的責任：那就是作家在改造人类的这桩好事中，首先就得从改造自己做起。

因此，苏联新文学本身的基础就是苏联作家自身的社会改造。他們应当首先重新改造自己，然后才能够担负起做未来人类的教师的任务。由此他們給全世界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巨大的、史無先例的經驗教訓。

从革命前的作家起到 1935 年的苏联作家，这中間所經歷的是一条漫长的峻险而艰苦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将是全世界进步作家的借鉴。尽管他們可以有不同的才华和不同的創作方法，但是，只有这一条是新的道路，此外都是旧的路了。在这条路上，作家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整个俄国的十月革命，全部社会主义建設就是作家們的一支規模巨大的“白海劳动队”。就像那些开鑿白海到波罗的海那条运河的罪犯一样，作者們受了苏維埃思想的熏陶，在劳动中改造了自己。他們不再是往日統治阶级的帮閑者，他們和無产阶级一道，成了無阶级的社会里的先鋒队。

这个比喻，大概会引起好些作家的反感，因为拿他們来跟小偷

和囚犯相比，是他們所不願意的。為了避免觸犯那些特別敏感的人，我把這個比喻拿來用在我自己身上，這樣就再沒有人可以說我在輕視我的同行了吧。而以我自己來作例子，不妨把這個比喻稍作更改：就一個從我們國家去的人看來，蘇聯就像是一個知識份子的“白海勞動隊”。我的意思是，一個從蘇聯回來的人，只要他從那邊多少獲得了一點勞動是必要的這個經驗教訓，就再不會是出發時的那個按照資本主義世界的秘方所造成的人了，儘管他自己並不甘心如此。

1930年下半年，超現實主義者阿拉貢，腦袋里塞滿了詩意的想象，對俄國的革命却是一知半解，他就这样來到了莫斯科，心里沒有別的想法，除了當它是一次新鮮的旅行，並且對旅行的意義，心里存着懷疑的、不可知論者的、和高人一等的想頭。

在我從蘇聯回來，給“為革命服務的超現實主義”雜誌寫的一篇文章里，可以看出我正作着一個人為了自衛而作的最後的掙扎。這個人，他如今又回到他旅行以前的老地方來，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感到自己和他們中間有了隔膜，心里很有點慚愧之意。最近我重新讀了這篇文章，確實我可以對你們這樣說，我對這篇文章的反應，就像一個在“白海勞動隊”里改造後的強盜，出乎意外又重新掉到他從前出身的那個社會的底層里，而他猶疑再三，不清楚如今自己干起正當的工作來了，不再到市場上去做騙子了，這樣是否便損壞了他那同幫的“名譽”。

舉一個例來說吧，在這篇文章里，作者挖盡心思來爭辯對旅行的看法，這種看法，我剛才已經提過，它在超現實主義者之間是很流行的。作者不免嘲笑一番，說旅行沒有什麼意義，即使是到蘇聯去旅行。那就是說，到這裡或到那裡去旅行都是一樣。但是，可注意的是，這一切都不過是用來掩飾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這一趟旅

行教这一个人再不跟从前一样了。这事实教他为难得着慌，教他感到屈辱。他一再地否認，但他越是否認，我越是相信这个人实在是个糊塗虫。

稍为認識我的过去的人，都知道我所講的那篇文章是我最后一次絕望的掙扎，其目的是要協調从前許多年來我一直保持的看法，和我所碰到的现实之間的矛盾。除了这种掙扎以外，那就是社会工作拯救了我，教我没有重新陷入到那旧世界里去，那个云雾騰騰的旧世界里去。那里，不久以前还曾經是我的那些老朋友們，用叫囂，用謾罵，想尽办法要把我拉住。我的社会工作开始于参加組織一个展覽会，作为对在万生納举行的法国殖民地展覽会的反击。这里我不打算对你們来談其中的細节。像敲釘子，在展覽室門口卖票，不論这些工作是那样的不值一提，但在类似的情况下，却比那些超现实主义者们对我所發的喋喋不休的爭論，对我更有帮助。

我的例子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我从前是一个最不善于干社会工作的人。許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些自認是根本的矛盾之中兜圈子。举个实例來說吧，譬如看到苏联对阿那托尔·法朗士的重視，我就連苏联的革命也怀疑起来，因为我仅仅看到法朗士不过只是一个在战时写了一本頗为蹩脚的爱国主义的作品，而且这个作家在文体上是反动的。还有，从前要是有人把我当作资产阶级的分子看待，我就觉得是一种侮辱，虽然事实上就是这样。我曾經竭力想使自己不属于资产阶级，可是我除了找一些話来否認以外，再沒有其他的办法。一切極端的形式，从前都叫我狂热地喜欢；像我那时候的許多朋友一样，我喜欢失敗的、古怪的、活不成的、长不了的一切。十分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从前的那些朋友之中，有两位曾經計劃很久，想写一本书，叫做“維護錯誤的騎士”。我从前也和他們一样，喜欢錯誤的一面。我的这种心情，大

家可以在我从前写的一本书，叫作“巴黎的农民”上看到。这本书很能概括我生命中的某一个阶段。那些正人君子们装模作样地把这本书拿来和我现在的作品对比，他们替我惋惜，认为我现在写得很粗俗。

作为在许多世纪中积累成的文学贝壳堆中和诗歌冲积层中生长起来的一个知识分子，作为这种文化传统发展到最高度的一个定形了的代表人物，对这么一个人，时代使他参加了革命，你要教他在文艺中不用革命的“辞句”，“左”的辞句，那是非常困难的。这种严重的幼稚病，曾经特别使法国工人运动受到损害。如果有人不嫌麻烦，有一天重新念一念我从1925到1931年所写的宣言、论文和诗歌时，大概特别引起一个有素养的读者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些“左”倾的辞句。这种非实事求是的对待革命现实所采取的态度，不是没有可笑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曲解它；因为那时候一切的经过，就好像魔鬼与天使的搏斗，写这些文章的过程也正是逐步摆脱“左”倾幼稚“辞句”的过程。但是其中经过多少次重犯，经过多少曲折！要是我能重温那时候的生活和文艺活动，那可以写出一部从未有过的小说。这小说我现在还没有写，并非因为我感觉过去可耻，而只是因为没有时间。事实上我一点也不因此而认为可耻；正像人们可以从我的过去和我的现在中找出种种矛盾来，但我并不因为这个而引为可耻。我可以坦白地说：想到过去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那末我对今天的自己，只能感到自豪。

作家们想在事后辩白他们思想演进的过程，这种企图是应当得到尊重的，但是这种企图也时常使他们不能对自己的转变作出正确的估价。举例来说吧，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我的朋友维克多·马格利德允许我对他说，他主张以群众的行动来反对战争这个声明，特别教我感动，因为它出自一个从前绝不会这样做的人。过去

他認為反對戰爭最好的鬥爭方法是用良心來抗議。但是，為了想要協調思想上前後這兩個不同的階段（參閱“公社”第18期），他無疑認為：既然現在有了一些新的看法，這也並不需要去否定過去的看法，這樣就顯得精神上更偉大。他這種想法，原諒我不能苟同。前後兩種方法基本上是互相矛盾的。維克多·馬格利德將來會跟着歷史的發展更進一步，這一點我可以肯定地說。將來有一天 他會否定他的過去，而這一舉也自有其偉大之處。

我所以着重地提到一個作家一生思想的前後矛盾，正因為我知道由於人們常常害怕自相矛盾而阻礙了自己的進步，儘管他們感到自己的思想，正像在歷史浪潮下的沙子一般，不由自主地在轉變，在移動。我這裡所談的作家，是指那些關心自己轉變的總方向的人，而不是指那些朝三暮四，一轉眼就可以從法西斯主義轉向共產主義，而又搖身一變而為保皇黨，却自以為永遠是“無所偏祖”。有各式各樣的矛盾。我現在所講的是一個人在發展中的辯證的矛盾，而不是指在鏡子面前迷失了方向的蒼蠅的亂蹦亂跳。

對於一個知識分子一生中可能發生的矛盾，實際上是可以找到合情合理的解釋的：那就是思想的發展不能離開客觀事實，而客觀事實的邏輯卻和孤立的思維邏輯有所不同。一個夠稱得上為人的，他所關心的並不是一個觀念，而是面對根本的、一目了然的事實：譬如說工人們面對着警察和槍口，比如說戰爭正在威脅着我們，法西斯已經在某些國家內取得政權。讓思想去認識這些事實，那才是保持人的尊嚴，而不應當是用各種借口教思想去接受這些事實，不論這些思想看來是多麼巧妙。

*
* *

剛才我談到自己，原因是這樣一個具體的例子，往往比光談規

律更能說明問題。但是，最好把这个例子和从浪漫主义时期以来作家所患的通病联系起来。这个毛病从浪漫主义时期一直到我們今天，是以各种不同严重程度的形式，各种不同的病情而出現的，从維尼^①的“象牙之塔”一直到于斯曼^②的进退两难（依归十字架还是面对手槍的槍口），从巴那斯派大理石的隱居之所一直到沙拉·巴拉頓的奇异的再生；从年青时代的無政府主义者巴萊思^③到年老时代的国家主义者的巴萊思，这些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在最著名的病例中，有一个例子，其重要性已經不限于法国的范围。从这个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种自發性的疾病的开端，及其危害性程度的广泛。我所指的是自古迄今最伟大的詩人之一阿尔杜·兰波^④和所謂兰波主义。在文学上，从本世紀初以来，人們的各种精神傾向都可以归結到兰波主义，都不过是兰波主义的具体例子。

后来当了我們“共和国”的大使的克劳台，就是首先看到这一点的：他看出从兰波这一个例子里，具有極大的說服力，有利于用来为腐朽的天主教服务。于是他就馬上动手用耶穌会教士最擅長的那套本領来歪曲事实。尽管費了許多笔墨，这一企圖今天畢竟完全失败了。不过兰波本身的确有其極端混乱的一面，可以被利用来达到各种目的，虽則兰波本人未必能完全同意。

确实，随着年代的进展，兰波变成了这样一个范例：主要不是因为他写出了世無其匹的美丽的詩歌，而是因为有一天他放弃写

① 維尼(Alfred de Vigny, 1797—1863)——法国反动浪漫主义詩人。

② 于斯曼(Goris-Karl Huysmans, 1848—1907)——法国自然主义派小說家。

③ 巴萊思(Maurice Barrès, 1862—1923)——法国狹隘民族主义小說家。

④ 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法国象征派詩人，曾参加了巴黎公社的起义。

詩的這一個事實。籠罩在他當時生活上的某種神秘，更有利於建立一種傳說，形成一個英雄人物，而被繼起的好幾代人引為榜樣。

蘭波的沈默和逃避給女巫製造了一種口實，使她可以對這位死去了的巨人口吐白沫胡說八道起來。可是，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應當叫那隨便捏造事實的人來看一看事情的真相。

確實，蘭波之所以令人贊嘆，並不是因為他後來沈默了，而是因為他曾經說了話。他的沈默，無疑是由于他找不到真正的聽眾，那是因為在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里，還不具备有這種聽眾。我們應當記得這個十分簡單的事實：蘭波於1871年自動趕到巴黎來參加公社的部隊。他在这時期所寫的詩，都是歌頌公社的詩。要是公社成功了，蘭波會做些什麼呢？這一點我們無法知道。但是我們却知道他在公社失敗後的遭遇。我們對保持沈默的、偉大的蘭波懷着敬意，面對那個卑鄙無恥的社會他沈默了。他感到惡心，直到向往於自殺。正因為他厭棄那個卑鄙無恥的社會，正是為了這個，我們負有責任改造這個世界的唯物主義者並不把蘭波看成是一個消極的范例。時代已經不同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經出現一個勝利了的公社。

在這個勝利了的公社里，作家的命運、詩人的命運、我們前面所講的靈魂工程師的命運是怎麼樣呢？在各種形式下，這個問題是會教人激動的。的確，回答這個問題，對許多人說來，是對蘇維埃制度優越性的試金石，是對無產階級重建世界所用的方法的一個歷史性的考驗。

特別在去年冬天，我們看到在“邊緣”雜誌上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這個雜誌徵求作家們的意見，問他們一旦革命到來，他們準備做些什麼？這個問題的提出，雖然是一點也沒有設想作家能够誠心誠意跟起義的工人們站在一起，但也無法避免不教作家在答

案中流露出深切的不安和疑慮。當然，利用這種不安和疑慮，有些人就大大發揮了他們的愚昧和無耻。在我看來，要找到這個問題真正的答案，倒不是在“邊緣”雜誌的篇幅里，而是在現實里，在蘇聯。

其實，這個問題的提法，不應當是一旦革命到來，你準備做些什麼，而應當是你會成為怎么樣的一個人。許許多多作家，即使他們目前并非法國無產階級的同路人，但這些人經過無產階級革命後，必定會發生一種目前他們自己也不能相信的轉變。要是他們願意體會一下去年秋天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所給予的經驗教訓，那他們就會預感到這種轉變，而且這種預感還能使他們看得更遠。

上面所說的一切，目的是要使作家們注意到個人立場的脆弱和在他們面前展開的命運；在這個命運中他們必然負有一定的責任。不是人人都懂得選擇自己的命運；有些人更先認識到歷史的發展，以及認識到真正的自由就在於接受這種發展，把個人的願望和新兴階級實現改造人類的行動互相關聯起來：這個新兴階級就是全人類文化的繼承者無產階級。在作家中間紀德^①近年來所採取的先進立場，是可貴的范例之一。

但是在蘇聯，全體作家，整個文藝界都已經站在先進的立場，這對我們來說，真是望塵莫及的。因此，沒有比深入的研究蘇聯作家的生平、工作方法、全部作品更為迫切需要。也可以說，對於法國的作家們，沒有比這更為有益的了。所以，不論蘭波的作品，他的生平以及他在哈拉的隱居是如何重要，但在當前更值得令人深思的，却是馬雅可夫斯基、巴士德爾納克和其他許許多多蘇聯作家

① 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於30年代初有過一些進步，但自1936年發表了“從蘇聯歸來”以後，背棄了無產階級事業而成為反動作家。